

贵州省老省长周林传略

龙先绪

(一)

周林(1912—1997)原名周国恩,曾化名张家麟,出生于仁怀县城南门外炮台上一个居民家庭,弟兄四人,他排行第三。1925年他与长兄周国桢,二兄周国荣同时进仁怀县中枢第一两级小学读书,因为他们学习成绩都很优秀,人称“周家三兄弟”。时学校校长陈佛中、教师罗剑僧思想都比较开明,特意选了《兴中会宣言》、《〈民报〉发刊词》等传播科学、民主的革命文献教学,使他们最早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

1928年春,周林弟兄三人考入遵义三中,当时桐梓系军阀周西城把持贵州军政大权,实行闭锁政策,独霸一方,而对青年学子则采取控制、禁锢思想,不许外出求学,逼走了在三中传播科学、民主思想的教育家黄齐生。但学生们受黄齐生追求进步思想的影响,纷纷外出求学,1930年夏天,周林三中尚未毕业,便与同乡同学李永桢一道去成都求学。他俩到成都后,考入学道街私立大同中学,学校是一位姓胡的先生办的,他早年曾在北洋军阀吴佩孚手下任过事,是个国家主义派。周林原以为离开贵州就离开军阀周西城的封建统治,谁知到成都后,四川军阀刘湘对学生的进步活动更加残酷镇压,周林认识到在四川也学不到新文化、新思想,因此在大同中学读了一年高中,便同李永桢一道顺长江而下到上海。上海是远东第一大城市,经济文化发达,是个求学的理想地方,但因生活费太高,经济

无力负担。当时 全国著名大学都在北平 且生活费比上海低 他俩便乘轮船到天津，转火车到北平。同年 8 月，二兄周国荣与同乡李永年、王秉钧和习水刘登矫等人也从家乡来北平求学。周林和他们都进宏文学院补习，准备考名牌大学。只有周国荣考入北平中国大学。

（二）

1931 年秋，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9·18”事变 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贵州先期到北平求学的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安顺人陈曾固和已加入北方“左联”的遵义三中同学陈沂等人，对黔北来北平求学的周林周国荣等同学，在生活上非常关心，在政治上积极帮助，邀约他们参加抗日救亡的游行示威活动，听东北军入的报告会，并介绍他们参加抗日反帝大同盟，编入民国大学支部活动。在他们的进步思想影响下，周林与在北平的贵州青年一起加入了抗日救亡运动，从而走上了革命道路。

1931 年夏天 遵义三中时同学桐梓李光勋 在北平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约周林到北平海淀区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办的平民小学当教员。在学校，他白天上课，晚上同学校老师一道外出散发宣传抗日救亡，反对内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传单。该校实际上是北平地下党海淀区委机关，李光勋是区委书记。由李介绍，周林在此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周林教了半年书，组织上便调他到北平东城区任共青团区委书记，负责与惠文中学、北大女子文理学院，朝阳大学等校的团支部联系。1933 年 6 月 北平地下党组织河北省委调周林到天津任共青团市委书记，因周林是南方人，一口南方音，继续留在北方工作易于暴露身份，1934 年秋 郑征夫决定将周林的组织关系转到上海地下党组织江苏省委。他到上海后，任沪西区共

青团区委书记，在青年学生中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

1935 年，周林任上海赤色总工会日本纱厂委员会委员，上海市纱厂委员会书记，在严酷的对敌斗争中，他不顾个人安危，深入学生、工人中间进行抗日救亡的思想发动和组织工作，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团员。1936 年周林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1 月 6 日，他与张维桢、陈之一、韩念龙等同志一起，领导发动了数万人参加的声势浩大的上海反日大罢工运动，创造性地贯彻了刘少奇同志《关于白区职工运动工作提纲》的精神和党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使罢工斗争取得了伟大胜利。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高度评价了上海反日大罢工。这次罢工斗争的胜利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作出了积极贡献。周林同志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的斗争中做出了突出的成就。

（三）

1937 年 8 月 13 日，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中国军队在沪东、虹口、杨树浦一带激战，成千上万个工厂被炮火炸毁，数十万难民无家可归。当天，马纯古、周林、宗瑛、冯伯华等人把日本商纱厂逃进租界的工人收进难民收容所，以便与失散的党员和工人骨干取得联系。1938 年，新四军与上海地下党江苏省委联系，要求动员一批青年学生、工人、知识分子参加新四军。周林在难民中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经过反复动员，组织 700 多人，作为首批参加新四军的“难民”，并负责带领他们去新四军驻地。周林负责各自不同系统的工会工作，并担任临时党支部书记。

轮船开出吴淞口，日本鬼子上船检查确属“难民”后才放行。到达温州，住了一个星期，新四军派教导队政治部主任余立金，组织科长刘先胜来接他们。出发前，领导又分别谈话，说明由温州去皖

南云岭新四军部，要经过国民党辖区的危险性。当他们到达浙江金华时，已很劳累，想休整几天。但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已迁到金华，对这支所谓“难民”产生怀疑，拟用火车送去南昌安置。周林觉察国民党当局的阴谋，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与会人员一致同意周林的主张，三十六计走为上策，立即行动，离开金华。在这个关键时刻，周林凭他多年的地下斗争经验和高度的革命警惕性，敏锐的观察力，发现了敌人的阴谋，及时采取果断措施，转危为安，到达目的地——新四军军部驻地皖南云岭。

周林到达新四军军部后，在教导队学习三个月。1939年，周林分配到江苏溧阳新四军一支队政治部任调查科长。当时，陈毅任一支队司令员兼政委。周林等人到一师后，陈毅为他们上的第一堂课就是讲列宁的《论“左”派幼稚病》。当时，时局大变，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已降于次要矛盾，党中央以民族利益为重，提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是完全正确的。周林听了课，深受启发。周林参加新四军后，始终随身带着《列宁主义问题》、《论“左”派幼稚病》、《政治经济学》和《论持久战》等书，在战斗空隙和工作之余，刻苦学习，学习马列著作成了他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周林参加新四军后一直在陈毅身边工作，陈司令员的谆谆教导，对周林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建立，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1939年11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成立，一、二支队合并，陈毅任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任副司令，周林任军法处长，主要负责保卫和锄奸工作，对混进队伍的坏人，经过审查，弄清事实后，逮捕法办。但有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他们出于各自不同的动机，到新四军后吃不了苦，情绪波动，甚至产生动摇。周林对这些人总是做耐心细致的工作，坚决反对采用王明那种“左”的肃反政策。

在黄桥第一次战斗中，为了保卫陈司令员和指挥部人员的安全，周林挺身而出，率领保卫队向敌人冲去，经过一个小时的战斗，

打退了敌人，还抓了几个俘虏。周林同志沉着、勇敢的指挥战士们，奋勇杀敌，显示了他临危不惧、英勇善战的本领。

（四）

1941 年秋，日本侵华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就确定在长江下游进行“清乡”，企图把新四军“撵到黄海边统统消灭”。同年 3 月南京汪精卫政府也将其定为国策，成立了“清乡”委员会，汪自任委员长，1941 年 7 月起先在江苏南部进行“清乡”。为了对付日伪军“清乡”，1941 年 3 月 19 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决定将苏北的东台、兴化及其以南、长江以北、运河以东的如皋、南通、海门、启东等县划为苏中区，并成立军政党委会，为苏中区最高领导机关，由周林等 7 人组成。在日伪的“清乡”区内，采取以区游击队、民兵游击战为主，以武工队（短枪队）对日伪汉奸进行重点打击为辅的战略方针。

1943 年 1 月，日伪军组织 15000 多人，对苏中区开始实施“清乡”，构筑起长达 200 多里的竹篱笆墙，圈进了三个半县，29 个区，400 多个乡。沿封锁线每隔 3 至 5 里还构筑碉堡，了望台，大小检查所 150 多个，派兵驻守。为了粉碎敌人的“清乡”，苏中区粟裕司令员决定采用华北武工队的办法反“清乡”，并由苏中区行署保安处长周林负责组织武工队。周林紧急动员，从苏中一、二、三分区的保安处抽调一批政治坚定，机智果敢，有战斗经验的公安干部和军队干部组成短枪队，加上苏中区行署保安处政治保卫队的力量，共 150 多人，建成一支武工大队，一律佩戴短枪，老百姓称为短枪队。其任务是深入敌人封锁的“清乡”区里，配合四分区的各县警卫团，游击队和民兵，专门捕杀汉奸和汪伪特工人员，所以又叫锄奸队。

1943 年 5 月初，周林亲自带领这支短枪队到四分区后，与该区保安处长陈伟达领导的政治保卫队合在一起，共有 200 多人的武

装人员。周林向四分区书记吉洛（姬鹏飞）汇报，并征得同意后，将这支部队交给对四分区情况熟悉的陈伟达具体指挥。在召开布署反“清乡”的斗争会上，周林给大家首先分析国际形势：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阵营胜利形势喜人，苏联对德国军队已进入反攻，美英正集结海空军，准备在欧洲登陆，欧洲各国反法西斯力量第三战线也在发展。在太平洋战场，美军加强了反攻。在中国战场，解放区军民不断给日寇以沉重打击。由于日军在东西线战线上作战，战线拖得太长，兵力不足，这次日军对四分区大规模“清乡”，不过是作垂死挣扎。周林强调在这个关键时刻，大家要有坚定胜利的信心，坚决粉碎敌人的“清乡”。同时，锄奸斗争，每个阶段都要按照上级党委的指示，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开展斗争。因为我军的军事势力在于千百万组织起来的群众，所以要依靠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打击敌人。周林的精辟分析，使大家认清了形势，增强了信心。会后，周林和陈伟达率领短枪队南下，夜间他们悄悄破坏竹篱笆墙，进入敌人的封锁区内，只见日伪军到处烧杀，村村烟火，枪声不断。在周林的指导下，经过几天的急行军，便将四个短枪队分别部署在南通、如皋、启东、海门等四个县的预定地点，并与当地的县委接上了关系。而这时，敌人还蒙在鼓里，不知短枪队已如神兵天降。

1943年，苏中区在极其艰苦的反“清乡”斗争中，由周林、陈伟达组织领导的短枪队深入封锁区内，与游击队、民兵相配合，灵活机动，开展群众性的锄奸斗争，神没鬼出地打击敌人，在9个月的反“清乡”斗争中共杀死汉奸、伪“清乡”人员及其他反动分子共计1600余人，给日军、汉奸汪精卫以沉重的打击，彻底粉碎了日伪的“清乡”计划。

在苏中地区反“清乡”的斗争中，周林坚决执行了粟裕司令员关于组织武工队，深入敌人封锁线内，重点打击日伪汉奸和特工人员，锄掉敌人耳目的指示，并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深入虎穴，与敌

人展开了反封锁，反“清乡”、反编保甲、反伪化的针锋相对的斗争。短枪队在这场群众性的锄奸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五）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一片大好，中国敌后战场已度过了最艰苦的岁月，日寇已处于孤立无援的穷途末路，这时毛主席和党中央作出了“扩大解放区 缩小沦陷区”的战略部署 并制定了八路军、新四军向华南、东南发展的方针，要求新四军一部份主力渡江南下，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根据毛主席指示，决定派粟裕的一师抽调三个团组成一批南下部队。当时周林、韩念龙两人都随部队南下。1945年1月13日 中共中央军委电令成立苏浙军区 由粟裕任司令，统一指挥江南的新四军部队。2月5日 在浙西温塘召开苏浙军区成立大会，周林被任命为苏浙区党委城工部长兼三地委书记。

1945年8月8日 苏联正式对日本宣战，9日毛泽东同志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的声明 号召八路军、新四军举行全国大规模的大反攻，12日，新四军陈毅代军长，命令苏浙军区立即行动，控制京、沪、杭要道 并占领南京、上海等大城市。城工部长周林奉粟裕之命，带着电台潜入南京附近，了解敌情，发现蒋介石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利用海空优势，抢占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中共占领大城市的部署已随形势的变化而不相适应，党中央只好改为夺取广大乡村及许多县城，向四周发展。9月19日党中央提出“向北发展 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新四军军部也指示粟裕率领江南部队撤回江北。11月中旬，新四军苏南、浙西、浙东的主力部队和地方干部65000多人 分别渡过长江 到达苏北山东与兄弟部队会师。周林过江后，奉命直接去山东盐城新四军军部报到。之后，成立华东军区，周林任直属政治部主任。

（六）

1947年7月中旬开始，蒋介石调集大军首先向华东解放区大举进攻，华东野战军在粟裕的指挥下，取得了“七战七捷”的胜利后，撤往苏北，与山东野战军协同作战，又取得了宿北、鲁南等一系列战役的重大胜利。鲁南战役后，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在山东临沂召开了干部会议，他作了《一面打仗，一面建设》的报告，号召全军应加强军政、军民之间的团结，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加强群众观念和群众工作，支持农村的土改斗争。周林到山东渤海三地委书记，领导和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建立人民政权，巩固解放区，迎接新的更大的战斗。

当时，华东野战军是全军兵力最多的，对国民党南京中央政府威胁最大，蒋介石视之为心患，调集317个整编师，43个旅，约25万人，另有20万军队作为机动突击队，派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坐镇徐州指挥，大军压境，形势严重，陈毅采取果断措施，率领华东野战军主动撤出临沂，向北转移，当时广大基层指战员不知道隐蔽作战的意图，认为是大踏步后退，思想不通，周林和直属政治部的干部，分别到各大单位，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以安定大家情绪。1947年5月中旬，华东野战军在孟良崮战役中，围歼蒋介石的王牌军74师，粉碎了蒋介石的“鲁中决战”计划，迫使敌人由进攻转入守势。1947年9月16日，济南战役开始，经过10多天的艰苦攻坚战，攻下济南。为了做好对大城市的军管工作，中共华东局抽调了大量干部，进行城市接管学习，1948年10月，济南战役后，周林奉调到济南参加学习，准备南下接管大城市。

1948年，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山东、河南等战场节节失利后，调集了80万兵力于徐州地区，妄图与人民解放军决一死战。济南战役后，华东野战军迅猛挥戈南下，坐镇徐州的杜聿明为了免遭被解放军包围歼灭的命运，主动放弃徐州，率部西窜，企图与黄维兵团

会师。中共中央华东局即令周林率领干部大队 500 人 星夜兼程南下，接管徐州。周林带上沙洪等几个新闻工作者和警卫员乘吉普车从济南出发，于 12 月 1 日凌晨赶到徐州，当日华野渤海纵队占领徐州，2 日成立了人民解放军徐州军事管制委员会。周林先与军管会负责人取得联系，随即成立了中共徐州市委和市人民政府，周林任中共徐州市委书记兼市长。军管会和市政府密切合作，除一面接管，一面复工外，还要全力投入支前运输。他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组织大批物资支援前线，为淮海战役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49 年 10 月 10 日，以徐州为中心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14 日，徐州市委召开各机关干部大会，周林作动员报告，深刻地阐明市委开展祝捷宣传和拥军运动的重大意义，并号召全体党政军民认真学习毛主席为新华社写的元旦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同时向各阶层人民深入宣传，揭穿蒋介石的假和谈。会后，成立了全市祝捷拥军筹委会，周林任主任。接着各界纷纷成立祝捷拥军筹委会，积极开展献金献物活动，各自派出代表到前线慰问部队。1 月 25 日晚 徐州市各界 6 万余人举行庆祝淮海大捷狂欢大游行。

1949 年 4 月 23 日南京解放，周林接到华东局命令到江苏丹阳县城集中，准备参加接管大上海。5 月初中共中央华东局在丹阳召开了干部会议，讨论接管上海的有关问题，周林担任政务接管委员会主任，草拟了接管上海各种组织机构的命令，印刷军管会命令和军管会代表任命书，刻制各种接管印章，印制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上海市军管会人员的胸章、臂章等，工作十分繁杂。

5 月 12 日 上海市外围战斗打响，25 日夜和 26 日晨 周林随华东局机关和接管干部一起，由丹阳乘火车到南翔，又由南翔分批乘汽车向上海进军。周林到上海的当天晚上，就到淮海中路中共中央华东局驻地，参加陈毅召开的会议，布置接管上海工作。他坚决执行陈毅市长对上海‘先进行接管 再进行改造’的方针 团结一切可

以团结的力量，仅用两个月的时间就顺利地完成了政府接管工作，为其他大城市加强政权建设，提供了范例。周林同志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七）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周林担任上海市人民政府秘书长，在陈毅市长的直接领导下，组织召开了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与会代表同心同德进行政治协商，充分发扬民主，为后来上海市的人民民主制度建设奠定了基础。

1951年，周林调贵州省工作，他先后担任中共贵州省委常委、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2年任中共贵州省委副书记，1954年11月至1964年任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兼贵州省省长。他在1959年5月、1964年12月两次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出席了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周林在主持贵州工作期间，正值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他和省委领导同志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经过两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修建了铁路、机场，结束和改变了贵州不通火车、航运的落后状况，他还领导建设了6个水力、火力发电站；兴建了一大批大型轻、重工业和矿产企业；他针对贵州山多地少，土地贫瘠的状况，大抓农田水利建设，扩大灌溉面积，采取宽松政策，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稳步发展，粮食生产实现了自给有余。周林同志与省委一班人团结广大干部，带领全省人民为贵州省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周林做出的卓越贡献，受到全省人民的爱戴。

1964年贵州的形势刚好转，一场“左”的灾祸降临了，那就是1964年8月至1965年11月的在全省范围内开展的一场大规模的“四清”运动。周林面对工作团的巨大压力，敢于坚持真理，敢于斗

争 实属难能可贵。他坚持历史是公正的 真理是永恒的 坚持自己“一生清白 不怕鬼”的坚强不屈的品格。1965 年 周林调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 在“文化革命”中 周林被贵州的造反派揪回贵州批斗 他和贵州省委的老同志被打成“走资派”长期关押在贵阳市郊大山洞贵阳耕读师专内。直到 1971 年冬，林彪一伙驾机外逃坠亡后，周林才被释放出来。

（八）

1975 年，周林和胡辉邦、程子华等老同志在中央高级党校学习结束后，分到江苏担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南京大学在文革期间 曾遭受空前浩劫，1976 年 1 月 周林到南大上任时 正值全国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之际 周林巧妙地和“四人帮”安插在南大的代理人进行了不曲不挠的斗争。保护了一大批干部师生免遭迫害，特别是不顾个人安危，支持南大师生的“3·29”革命行动 将以光辉的一页载入史册。

1977 年 10 月，中央调周林到北京任国家教育部副部长，兼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北大在文革是重灾区，从聂元梓贴出的第一张大字报到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的煽风点火 以及两校大批制组“梁效”的肆虐蛊惑 使北大深受其害，十年动乱中，“四人帮”的北大代理人聂元梓，长期夺占了学校的党政大权，把北大变成了“四人帮”反党乱国的重要阵地。周林到校后首先宣布对“四人帮”的北大代理人聂元梓进行隔离审查，打破了北大的沉闷状况，振奋了人心，增强了广大师生的信心。在深入揭、批、查的过程中 周林发现在北大发生的几起影响全国的重大事件，都与康生的阴谋活动有关，1978 年 12 月 19 日，他在北大党委会上召开了揭批康生等人的大会，全校师生群情激奋。

周林在主持高等学校工作期间，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政

策。为消除“文化大革命”给教育战线造成的严重恶果，为恢复教育工作秩序，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育质量，殚精竭虑，忘我工作。他坚决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实现政治上的安定团结，使学校的各项改革目标得以实现。他在担任教育部领导期间，创造性地开展工作，领导制定了一系列教育体制改革的方针、政策。针对高等教育轻文重理的弊端，强调要注重文科教育。在他的领导主持下，恢复、建立了我国高等学校的社会学专业。他高度重视高校文科教材的建设，领导恢复了高等学校的出版机构。周林同志为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呕心沥血，勤奋工作。他具有很高的教育理论造诣，著有不少教育专题报告和文章，至今对教育工作仍具有指导、启迪和教益作用。它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是我国教育战线上的一位优秀领导干部。

周林十分重视我国古代典籍的整理工作，1981年兼任全国高校图书馆工作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副组长，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主任等职。他虽年事已高，仍勤勤恳恳，不懈地努力，为推动高校图书馆建设和情报服务自动化进程，为高校的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周林十分重视古籍整理研究工作，他领导建立了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注重继承优秀文化遗产，总结经验，开创性地开展工作。在他的领导下，已出版了《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和《全宋文》、《全宋诗》、《全明文》、《全明诗》、《全元文》、《全元戏曲》、《全唐五代诗》、《清文海》（简称“七全一海”）等大型著作。为古籍整理研究，抢救古籍遗产，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人才培养和事业队伍的建设等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做出了显著的成绩。这是周林在他革命生涯的后期，为党和人民再次作出的杰出贡献。

1982年，周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周林再次当选为中顾委委员。他在长达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具有过人的胆识和智慧。他出生入死，临危不惧，无论是在白色恐怖的环境里从事党的秘密工作，还是在新时期开拓各项事业，无论是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始终具有坚强的革命意志和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他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坚持无产阶级党性，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淡泊名利，顾全大局，他胸怀坦荡，光明磊落，坚持原则，无私无畏，他工作深入，作风民主，平易近人，联系群众，爱护干部，他率先垂范，廉洁奉公，对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求严格。充分表现出优秀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他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不愧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从将军到外交家的韩念龙

龙先绪

韩念龙(1910—2000)贵州仁怀市中枢镇人,1927年在遵义三中读书期间,深受校长黄齐生的影响,立志追求民主革命真理,报效祖国。1929年毕业后,因不满贵州军阀周西城不准黔籍学生外出求学的高压政策,怀揣200块大洋,晓行夜宿走路到重庆,然后坐船到南京,再坐火车去上海,进入了广西名流马君武在上海创办的中国公学,主攻美国经济。该校当时名师如林,王造时、周谷城、罗隆基,以及客座教授胡适都授过他们的课。1931年“一·二八”淞沪战役,日军炸毁中国公学,韩念龙与同学们一道搬迁到法租界上课,完成学业。

“九·一八”事变后,韩念龙经常参加学生救亡宣传活动。他曾在田汉创作的《伊通河畔》中扮演配角。他原名蔡仁元,当时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差不多都知道有个“老蔡”,著名戏剧家夏衍在他的长篇回忆录中多次提到“老蔡”,足见他当时已很有名声。1935年韩念龙加入中国共产党,与陈之一、郭光洲、张继桢、周林一起领导发动了六万多人参加的声势浩大的上海反日大罢工运动,创造性地贯彻了刘少奇同志《关于白区职工运动工作提纲》的精神和党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使罢工斗争取得了伟大胜利。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高度评价了上海反日大罢工运动。这次罢工斗争的胜利,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38年秋,韩念龙在上海崇明岛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1939年秋至1941年秋,任江苏崇明县工委委员兼游

击队政治部主任 崇启海三旅政治部主任 新四军一师三旅九团政治部主任；1941 年秋至 1945 年夏，先后任南通警卫团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副县长 新四军苏浙军区三纵八支队政委、三纵政治部主任；1945 年夏至 1949 年 11 月，历任华中野战军八纵政治部主任、军调部驻淮阴执行小组代表 华野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华野四纵十师政委、华野四纵政治部主任、华野三十三军政委等职 成为陈毅麾下一名能征善战的将军。解放军占领黄浦滩头后 韩念龙出任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副政委。

1950 年，美国侵略朝鲜战争爆发，韩念龙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俘管团团长。此时，一纸令下调他到北京外交部工作，他找到老首长陈毅陈述：他不去，因他不懂外语。陈老总听了大怒：“不懂就学 你是军人 你懂不懂纪律 懂不懂命令 服不服从指挥？”韩念龙星夜兼程赶赴北京。当时与韩念龙一起担任大使职务的还有耿飚、姬鹏飞、黄镇等一批声名显赫的战将。毛泽东主席对他们说：“之所以启用诸位将军 就因为不怕你们跑 外交也是打仗 不是用真刀真枪 而是用嘴打仗。”周恩来总理也说：“这叫武打文仗”。从此 韩念龙开始了他长达 40 多年的外交生涯。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基斯坦、瑞典大使、外交部部长助理兼办公厅主任、外交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顾问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党组书记，后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韩念龙是一名将军出身的出色外交家，又是一名学有成就的儒将。举凡二十四史、十三经、四库全书总目都常置于他的案头 在资深的外交家中 他的藏书 特别是古典线装书籍 堪称第一。他曾说，毛泽东主席所讲的典故，他大多都是知其出在何书。他常以“胸无点墨 自是伧夫”以自警。1979 年国庆节 叶剑英主席作了长篇讲话，他率团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第二天看到新华社的长篇电讯，心潮起伏，作诗一首以表示他的心系祖国和人民的赤子之情：

宏文读罢感喟深，百端交集自沉吟。
卅年岁月浑梦幻，千秋功过应分明。
惊涛骇浪皆魔障，屈死冤魂尽忠贞。
四化宏图齐共勉，试看华夏定中兴。



革命烈士王启霖传略

朱 澈

启霖同志（化名王慰民），原籍贵州仁怀县，1915年阴历8月25日出生于贵阳。他的父亲王谟是地方军阀政府的高级文官，为人慷慨，思想开明。母亲翟菊仙也极温和，凡事通情达理，支持子女从事革命工作。兄弟姊妹和睦友爱，求学风气很浓。姐姐启凤（紫非）和弟弟启澍，都在抗战时期走上了革命道路，又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启霖同志1927年毕业于贵阳正谊小学，升入省立贵阳第一中学。在读到高中二年级时，于1933年考入广州中山大学理工学院化学系。

当时的中山大学，一方面是抗日反蒋的浪潮冲击着校园，另一方面是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控制，某些封建遗老遗少又大肆鼓吹读经复古，启霖同志在进步教师和进步同学的影响下，对国民党蒋介石不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极为不满，对学校的坏风气也极反感，曾在校内刊物上撰稿抨击“读孝经复古礼”之类的论调。加之他对所学专业感到志趣不合，便于1934年休学，到上海、杭州一带见世面和自习文学。他读的书很多，特别喜爱鲁迅先生的作品。鲁迅先生弃医习文，决心医治人民大众精神疾患的选择，对他的影响颇深。

1936年，他带着极大的希望去日本深造；先在东京学习日语，准备投考大学。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他满怀爱国热情回到广州，10月回到贵阳，随即投入党领导的抗日救国运动。

1938年2月到1939年初，启霖同志担任《贵州晨报》副刊《每